

那些闪亮亮的文明印记

——中国出土金银器略述



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银瓶(北周)。

苏句容出土的29枚南宋金牌，正面或两侧用字模砸印文字，成色标注有“十金”“十分赤金”“张铺十分金”等；明代湖北荆恭王朱翊钜墓杏叶金执壶刻铭“致成金壶壹把”，筒形金盒底刻“大明万历辛丑年银作局造八成色矿金”，还有“五色金”“柒成色金”等表述，清晰呈现器物的金银纯度等级。

与制作主体和质量追溯有关的铭文，体现了古代金银器生产的规范与责任体系。部分器物会标注商铺和工匠信息，如南宋溧阳县平桥乡窖藏银铤，中部戳记“谢铺记”，“谢铺”作为制作商铺，其标识成为产品质量的隐性保障；元代无锡崑山钱裕夫妇墓金杯，口沿外侧铭文“邓万四郎十分赤金”，“邓万四郎”为工匠姓名，明确质量的责任主体。

除日常使用与流通过外，金银器在进奉、馈赠等特殊场景中，更凸显其财富价值与社会功能，成为权力博弈、人情往来的重要媒介。

进奉是古代地方官向皇帝额外贡献金银器的重要形式，这类器物多体量较大、工艺精湛，价值远超普通金银器，目的是邀功取宠、谋求晋升。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唐代双凤纹大银盘，直径84厘米，重2850克，盘底铭文标注进奉者为“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田裴肃”，其重量相当于九品官七八年的俸禄，加之制作工本，价值不菲。这类进奉器物不入国库，直接进入皇室支配的琼林、大盈二库，进一步强化了皇室对金银财富的掌控。

馈赠场景中的金银器，则成为人际交往、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寿礼馈赠中更为常见。靖州会馆学相关的银盏托，正中鏤“寿”字，两侧分栏鏤刻16位献寿人姓名，将金银器与集体馈赠礼仪结合，既体现对受赠者的尊重，也彰显馈赠者的财富实力与人际关系。

出土金银器的铭文，有时还承载着价值确认、品质溯源等重要功能，涵盖材质成色、制作主体、用途等关键信息，成为解读古代金银器贸易与工艺标准的重要依据。

在材质成色标注上，不同时期的铭文呈现出多样的表述，反映了古代对金银纯度的精准掌控。江

金银，以其稀有性、稳定性与延展性，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义的特殊载体。中国出土的各类金银器，跨越数千年时光，见证了不同朝代的经济发展、工艺进步、审美变迁与文化交融，是解读古代社会风貌的重要实物资料。



“南海1号”沉船出水的金璎珞胸佩(南宋)。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阿鲁柴登出土的鹰顶金冠饰(战国)。

见证文明互鉴与文化创新

中国的金银器制作，还体现出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特点，既吸收异域文化的工艺与造型，又融入本土文化特色，经过改造创新形成独特的风格，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

西汉时期，中外金银器的交流已初现端倪，西域文明的工艺与造型开始融入中国金银器制作，最典型的代表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该银盒造型与工艺，与伊朗国家博物馆藏阿契美尼德王朝薛西斯一世金碗、弗利尔美术馆藏阿塔薛西斯一世银碗造型相似，均采用锤揲工艺打造圆形器身，纹饰布局对称，这类风格被西方学者称为“阿契美尼德国际风格”。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江苏西汉刘非墓等也出土了类似风格的金银器。

胡瓶更是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鲜活例证。胡瓶原产于粟特地区，以其独特的造型适配游牧

承载审美变迁与生活格调

金银器的时尚属性，体现在器型、纹样、工艺的不断革新与演变中，既传承传统审美基因，又贴合不同朝代的时代精神与精神追求，从自然纹样到吉祥寓意，成为古代社会时尚潮流的直观反映。

早期金银器多借鉴青铜礼器形制，体现对传统礼制的延续，后期逐渐突破礼制束缚，融入生活需求，形成多元器型体系，兼顾实用性及审美性。

宋代是仿古金银器的鼎盛时期，工匠多仿周青铜礼器造型制作金银器，赋予器物古朴典雅的格调。江苏溧阳平桥乡小平桥村宋代银盏，就是仿周青铜簋的形制，颈部外饰两周云雷纹，腹部及兽耳饰方格乳钉纹，以云雷纹为地，圈足下部刻一周云雷纹，工艺精湛，是宋代仿古工艺品的典型代表。这类仿古器物并非单纯复刻，而是结合金银材质的特性优化细节，既传承青铜礼器的庄重气质，又凸显金银的奢华质感，满足文人雅士对古风追捧与审美需求。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金银器逐渐向日常实用器延伸，器型涵盖饮食器、装饰、服饰配件等多个品类，贴合生活场景的同时引领时尚潮流。饮食器方面，宋代出现莲花形银碗、梅花形银盏，元代有菊瓣形金盏、银盘，明代有高足金杯等，造型灵动，适配不同饮食需求；装饰则以步摇、簪、梳等为主，东汉甘肃凉州出土的金步摇，整体造型近似树，树干有细长叶片，中心细茎饰花朵，中部立金鸟，喙衔环缀圆形饰片，行走时垂珠晃动，成为当时贵族女性的时尚配饰。

服饰配件类金银器的创新，推动了时尚潮流的传播。唐代金梳盛行，王建《宫词》中“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从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生动描绘了唐代女性佩戴金梳的时尚场景。文物中，长沙唐代金梳、《唐人宫乐图》中的金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商)。

梳形象，印证了这一潮流。

金银器的纹样设计始终紧跟时代审美，从传统几何纹样到自然纹样，再到吉祥寓意纹样，不断丰富，既展现自然之美，又承载着人们的美好祈愿。

自然纹样在金银器中应用广泛，莲花、菊花、梅花等花卉纹样尤为突出，各朝代结合时代精神赋予其不同内涵。例如梅花纹样因“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的精神内涵，成为宋元明清的时尚纹样。南京市浦口区南宋张同之夫人章氏墓银盘，整体呈五瓣梅花形，盘内满饰细云纹，压印折枝梅花、弯月与流云，梅花上鏤刻花蕊细节，融合水、月、梅的意象，契合宋代诗词咏梅意境，将自然之美与文人情怀完美结合。

金银器工艺的不断升级，是其时尚质感的重要保障。锤揲、鎏金、扭丝、镶嵌等工艺的应用，既展现技术实力，又赋予器物独特的视觉效果与触感。

锤揲工艺是金银器制作的核心工艺之一，能将金片打造成出立体灵动的造型，广泛应用于簪首、器物纹饰等部位。湖北荆门明代银簪，簪首作花瓶状，用鎏金银片锤揲而成，呈现蝶翅造型。花瓣处用银丝扭成弹簧状，穿缀珍珠，兼具锤揲、扭丝、镶嵌多重工艺，质感丰富。鎏金工艺则能提升器物的奢华感，明代银簪多采用银制鎏金工艺，既降低成本，又呈现黄金的璀璨色泽。例如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金银器，部分采用鎏金工艺，融合异域风格，见证文化的交流融合。镶嵌工艺的应用，则进一步提升了金银器的精致度与价值，如明代定陵出土的金银组扣多镶嵌宝石，色彩搭配和谐，尽显皇室奢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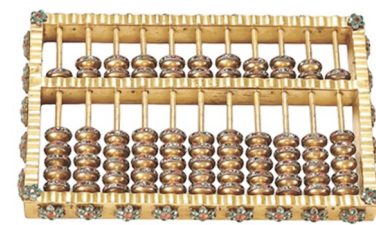
这些工艺的不断革新与组合，既推动了金银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又赋予器物独特的时尚质感，使其成为不同朝代艺术审美的见证。



变迁；作为时尚象征，其器型、纹样与工艺的创新，反映了不同朝代的审美潮流与生活格调；作为交流纽带，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互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性。这些闪亮亮的文明印记，既记录着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对美的向往，也见证着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据《光明日报》)

清代铜鎏金嵌料算盘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八棱金杯(唐)。

该铜鎏金嵌料算盘长15厘米，边框为铜鎏金材质，四角及外壁嵌饰五瓣宝石花。盘珠呈扁圆形，腰部镶嵌红绿宝石为装饰。

据介绍，该算盘品相完美，工艺精细规整，时代特征鲜明，展现了清乾隆年间铜鎏金工艺的风貌特点。(据《侨乡科技报》)

从“美”的视角“打开”河北古代艺术珍品



单柱铜爵(商)。

由中国美术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饰文焕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作为中国美术馆墨韵文脉系列展，本次展览汇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保定市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定州博物馆、临城县邢窑博物馆、磁州窑博物馆8家文博单位的110余件(套)文物及相关展品，从“美”的视角，梳理和呈现河北古代艺术珍品。

河北，又称燕赵之地，山河形胜，文脉悠远。其地当要冲：东临渤海、西接太行，北跨燕山、南临中原，成为多元文化交汇之所，孕育了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文化底蕴。



铜胎掐丝珐琅凤耳瓶(明)。

从于家沟遗址的管珠到磁山文化的红陶，映照出早期日用器物审美意识的萌发；从燕下都、赵王陵、中山国到满城汉墓的青铜器、金银器、玉器，彰显出农耕文明的端庄礼制与游牧民族的灵动气息；从湾漳大墓的壁画到曲阳石雕的塑像，体现出西域艺术的瑰奇奔放与中原艺术的温润典雅；从邢窑、定窑到磁州窑的瓷器，折射出南北文化的交融激荡与雅俗趣味的相依共生；至元、明、清畿辅之地，金髹彩漆的漆器、珐琅器等，更承载着宫廷与民间工艺百花齐放的盛况。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代太白醉酒粉彩瓷板画



该粉彩瓷板画的尺寸为62厘米x38厘米，描绘唐代诗人李白醉酒后的情景。据介绍，该藏品为近代陶瓷美术家王步创作的粉彩人物故事瓷板画，画面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据《侨乡科技报》)

能工巧匠复刻经典

竹丝再现《秦陵铜车马》风采

秦陵铜车马，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嵯州竹编艺术家们以精湛的竹编技艺再现了原物的风采：4匹高大的公马驾着一辆单辕双轮的安车，车上跪坐着御马者。秦陵铜车马虽处于静止的状态，却给人一种车马待发的动感。4匹御马身軀结实，头部高昂，棱角分明，双耳犹如削竹，双眼宛如悬铃，鼻翼方而开张，马颈浑圆硕长，四肢伫立如柱，一看便知是耐久善行、机警敏捷的神骏。御马者面庞丰满，抿嘴挂目，直视前方，头戴切云冠，腰佩青铜剑，双臂前伸，手握六轡，显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1989年，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俞樟根主持，徐华铛造型，胡六久、许明德、沈孝炎等编制的大型竹编《秦陵铜车

马》诞生。竹编的能工巧匠们在创制时颇费了一番心血，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种艺术意趣。4匹驾车的公马，一律采用漂白白色为主并间杂古铜绿色的竹丝，巧用挑压法编织而成；马鬃是用同样色泽的竹丝粘插上去的，白中透出丝丝古意。然后配上竹编的络头、缰绳和竹雕的马衔、马轭、马辔、当卢、金泡、银泡，使4匹驾马格外有气势。

铜车的装饰上巧妙地运用多种花纹与编织技法：四周箱板采用了连脚“万”字图案，环环相套；箱板的下部采用满天星编织法，工整规范；椭圆形的安车蓬盖采用了镶嵌锁壳，中间采用硬板花图案，典雅古朴；车轮编织采用了方格纹编织图案，节奏协调。这些竹编图案不仅体现了出土铜车装饰的排列

图纹，而且更富于竹编创新的意趣。

整个作品以竹篾的天然色泽为底色，图案采用红棕色，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原铜车平淡素雅的基调。御马者的衣服均用竹丝编织，衣纹的编织随躯体而变化，颇有“曹衣出水”的艺术趣味。人物的脸部由于面积大小，不易编织，就采用了篾片编织面的粘贴工艺，即先用极薄的篾片编织好平面，再粘贴到人物脸型的木模上。这是一门技艺水平较高的工艺，不仅要编得精巧细密，而且在粘贴时要注意脸部的凹凸面，不能起皱，方能使其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竹编《秦陵铜车马》。

竹编《秦陵铜车马》长140厘米，高62厘米。1989年秋，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新馆落成时，参加了全国工艺美术品展览。专家们对巧妙运用各种编织法去体现铜车原来图纹装饰的工艺，深表赞赏。(据《联谊报》)